

关于柞伯鼎关键问题质疑解难

黄盛璋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Abstract: The inscription on the bronze Ding of "柞伯" recorded the two wars to the south of the Zhou territory and the Hun state. The Hun state crusaded against the south of the Zhou territory and Duke Guo Zhong crusaded against the Hun state. The Hun state adjacent to the Zuo and Cai States located the valley of the Huaihe River. The state originated from Dongyi gradually migrated to the valley of the Huaihe River because of the wars with the Zhou Dynasty. The Hun state crusaded against the south territory of the Zhou Dynasty to expand the territory and back to hometown.

Key words: bronze Ding of "柞伯"; Duke Zhou; Hun state; Dongguo; Nanguo; Dongyi; Nanyi; Huaiyi

摘要: 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

关键词: 柞伯鼎；周公；昏国；东国；南国；东夷；南夷；淮夷

一、柞伯鼎铭存在的关键问题、重大争论考察揭要

先释柞伯鼎铭文如下：

佳（维）四月既死霸，虢中（仲）令柞伯（伯）曰“在乃圣祖周公，繇又（有）共于周邦。用昏无及，广伐南国。今女（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令蔡侯告遂虢中遣氏曰“既围昏。”虢中（仲）至，辛酉博戎。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其弗敢昧朕皇祖，用作朕刺（烈）祖幽叔宝尊鼎。其用追享孝，用祈眉寿万人（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一）《文物》2006 年第 5 期刊载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东征》，对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5 年征集入藏的柞伯鼎铭文有关史实、年代、地理、民族等问题详予考证，提出一些新见，为鼎铭研究铺垫前进道路。但还存在一些关键问题，

需要进一步商讨解决，使其重要价值更能彰显，并对西周金文与古文字学以及地理、历史研究都能起更多作用。最近我正在撰写《西周金文战争与民族历史地理研究》，作为《两周金文大系续编》中几个要项的综合研究，以免在正卷中产生多次纠葛，先予梳理疏通。此鼎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既为拙稿增补新篇，也为已提出若干论点互证、匡补。多年用心，不少能予解难决疑，至为难得，实有“冯妇攘臂下车”，一举擒获的振奋心情。但是一如战争，哪里能想像这么简单？何况包括两个战争，牵涉不同时间、地域及主持者，问题复杂、纠葛，不同一般战争。朱文广征博引，资料甚丰，实是费力之作。按我一贯主张应运用全局、发展、辩证综合三个观点，进行科学“三真”、“三查”，除复按朱文所有资料证据之外，尽我所能查检有关资料、证据，已超过朱文范围，现还不能说全备，但确已发现诸多重大史实真相有异于朱文，而皆为铭文根本与要害问题。铭文牵涉伐南国与伐昏两次不同战争的时间、地域、主持人等历史与地理，尤其是地

域演变极为纠葛，而都无可调和、折中解决。争论症结就在于铭文文字、文句的考定解释之异同，这是立论的根本基础，即使有很大困难，也无法回避。先后近两年，主要就是在试图清除这些拦挡去路的钉子，牵扯实在太多，而紊如乱丝难理，“并非好辩，实不得已”，决非求胜于任何人。很多烦琐考证，连我撰写此文过程中，也深感头痛眼昏，何况读者。先讨论解决铭文中最为关键与争论中要害问题，仍较纠缠，为便读者易看明白，有必要简括讨论关键问题、指导思想、解决方法与途经。至于纠缠最多的古文字、字句解释争论，从来并未完全查明的昏被称为“戎”的族属、源流，和必须最后综合总结论定的绝对王年断代，皆留在下篇讨论。

(二) 鼎铭最重要价值，首先就在两次战争，开首就记“虢仲令柞伯曰：……用昏无及，广伐南国”，紧接着令柞伯率蔡侯“围昏邑”攻昏。两者有何关系？究竟是谁“广伐南国”？为何要伐昏？朱文作为重点论证，定为周公广伐南国，详解战争时间与南国地域，而和伐昏时间、地域完全隔绝、分开。但是按我研究，伐南国不是周公，而实是昏，与伐昏时间先后紧接，地域也很有关系，不是相隔数王、地域又无关之战争。如此，铭文全貌和结论就全不一样，而所牵涉战争历史、地理、民族，也都大有不同。铭文提出很多新的内容，尤以伐南国战争的时、地、人（即主持者）真相不明，引出问题最大。次为伐昏的时、地、人（即主持人），虢仲“令柞伯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柞伯）令蔡侯告遂虢仲”，等虢仲最后至，才发动进攻。虢仲必右至昏邑，即从左右合围昏邑，右围为主，否则决不能面命规定“左至”，不能只有左围，而无右围，也围不住，更非作战所能允许。战争主持者与决定攻战者都是虢仲，他必带有一定士兵，包括护身卫兵，而绝不可能单人前往。但鼎铭只记“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战果之少实为金文仅见。这是因鼎铭为柞伯所作，只记自己战功，连蔡侯战功也皆未交代，所以虢仲也只字不说。伐昏战果决不能只此。为何伐昏，开头就已交代明白，这些都是柞伯鼎铭症结问题与要害所在。笔者拟先将铭文中两次战争直接相关的人、地、时、事，及其密切关涉文字、文句之争论、解释，进行论证确定落实，未必皆是，谨求各方匡谬，明辨是非，以为改正基础。

(三) 铭文文字大都前见，但是也有个别新见，即朱文隶定为“徵”者，金文早就出现数组相似之字，隶定、考证各有异说。最多一组就是被释为“徵”之字，亦即朱文所本；也有下多从“贝”，用为货贝之名，旧多释为“遄”；还有其他不同解释之字，旧皆不能确认，就是因字形结构、音、义、用法，诸皆不明，纠纷至今。鼎铭此字，字形结构、字义、用法皆和以前明显不同，不是一字，故为新出。和以前数组结构用法不同各字之形、义、用法异同比较，得以深入各层查明。古文字形、音、义既是统一的，必须一同研究解决，有一不能落实，就都不能过关。过去释为“徵”字，外形近似，结构不同，用法有别，本文一一考明，都不是“徵”字，必须分为数组。现只论证鼎铭此字，它就是一直使用假借，本字失传的“遂”，义为预期意愿初成，实为秦统一文字时罢其与秦文不合者，不仅战国各国，以前“遂”字也皆废除不行。至今皆未能分辨，就在于形、音、义皆有众多纠缠，没有用法比较，无法证明本字形与义为何？本文从形、音、义全面研究，查明“遂”字形、音、义源流演变，与其长期假借用法过程，特别是字形结构所表原意，表示初成、遂愿，进而比较与其他组异同、混淆、不明所在。由于鼎铭此字结构、用法明确，从而解决长期疑难，非常关键，应是此鼎铭文对古文字研究一大贡献。至于与其他数组争论，需专论阐明。此文只讨论“遂”字形、义源流，与用法关系，在此指要，以免正文纠缠不休。

(四) 铭文也有少数文字，自《说文》就已源流失明。这里只提出旧皆不明与误解的“共”字形、音、义及用法渊源关系。铭文“圣祖周公，繇有共于周邦”，朱文隶定为“共”，通假为“功”，解为有功于周邦。但此字字形结构，实是从双手奉祭器，是“祭供”的“供”字初文，由祭供义引申为“恭”。两周金文约30处，最早皆用为“供”，后由祭供义引申扩展为“恭”，后加心旁专造“恭”字，与加人旁为“供”，皆为后造专字，以为区别。“共”就是“供、恭”两字的初文，西周金文原只有此二用法，后仍为汉碑沿用，与从工声的“功”非同一声，不能相假。“周公有共于周邦”，实因祭祀、供献宗庙，获得祖先保佑周邦。而“功”来源于人事战争、政治等，为人为关系，而与祭

祀宗庙得上天祖宗保佑、获福祚，来源于人与神根本不同。殷周皆尊宗庙神鬼高于人事之上，形成宗法制度，成为政治统治基础，而与后代观念根本不同，往往不被理解、认识。在此可通用的贡献，而今一般不知词汇来源与古汉语用法区别。现代汉语“贡献”意同有功之“功”，实系来源于欧语词汇的外来语，而为汉化的词汇，而古汉语贡献一词为下进献上财物，绝无功意，两者意思、用法根本不同。共与其后起字供，用于供献神鬼，后代引申用于人事，同于下献上，用为敬语，但是从无功绩、功绩之意。所以铭文有共于周不能是有无功绩之意。此字另一重要价值是，西周金文有一字，上从凡声，下从手奉祭器，而与“勤”连用，旧释“劳”或“奉”，是非不明，而称“劳勤”或“奉勤大命”。朱文疑与此字同为“共”，但它明从“凡”声。我确定是“奉”非“劳”，也不是“共”字。两者皆用于祭祀，“供奉”连文，皆表供奉或贡献宗庙，获得神鬼保佑，从而具有今“贡献”之意，皆源于神鬼，非出于人事之“功”。另专论刊发。

（五）铭文也有词汇，初见此鼎，即前后皆未见过的“无及”。旧所不知，以致朱文误释为周公不可及。“无及”即无忌，即昏肆无忌惮。而广伐南国，“广”同“横蛮”、“凶横”之“横”，不是广泛意。“广伐”与“无及”都是贬义词，说的都是昏，不是、也不可能说周公。这是虢仲交代所以伐昏的原因。朱文都解为周公敏警无人能及，敏警为褒义词，而昏为贬义词，义正相反，不能通假。“昏”与“民”字形极近，从昏与从民声的字书写印刻，又最容易发生互混不清，造成古文字学与训诂学上重大纠缠近两千年。《说文段注》一再强调“昏声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讹也”，“昏字从氏省为会意，决非从民声为形声字也，盖隶书淆乱，乃有从民作昏者”。《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氏声。氏者，下也”。铭文正是上氏、下日，氏不是从“氏”，更不是从“民”，昏原意表日下落到地前，就是黄昏。后起孳乳、引申都是表不好之事，即贬义词，如“昏迷、昏沉、昏庸、昏乱、昏愚、昏暗、昏聩”等，其所从之字如“愠、殄、暗”等也皆如此。而从“民”之字多是其相反之褒义词，如朱文所举之“警”。昏国绝非自称，乃是被周称为“昏”，也是证明。“用

昏无及”是说昏国肆无忌惮，无国可及。“无及”、“广伐”都是贬义词，决不能表周公警敏无人可及，广伐南国。我在历次古文字研究会上坚决主张慎用通假，从严毋滥，否则为自己开方便之门，而为研究大戒。究竟是谁广伐南国？是周公还是昏？为什么要伐昏？直接关乎战争的关系、原因。所得的结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关键就在于古文字渊源纠葛，与词汇褒贬、句法用意不明，解释差异，导致铭文面貌完全改观，一时很难看清楚。

以上三项皆不限于铭文本身，更多是牵涉铭文以外史事，必须合一研究，统一解决。后者价值更大，但是正文论证，只限本身问题，以外都必须全面专论刊发，所以先将关键论点、结论简述于此。

（六）年代问题既是柞伯鼎的根本，也是史实讨论重要基础。朱文分析此鼎文字、纹饰、形制，认为“时代宜定在西周晚期，如考虑铭文文字特征，当以厉宣时代为妥”。纹饰、形制都通行较长时间，只能断相对年代，不能定绝对年代。按通行分法西周晚期包括厉、宣、幽三王世，中期为穆、恭、懿、孝、夷五王世。据我考订，此鼎应属中期夷王世。昏广伐南国，对周说来，不是一件小事，不能不征伐，以宣周威德。但是王不亲见、亲令，全由虢仲主持代行，令柞伯率蔡侯围昏，而战绩甚微，凡此皆为金文仅见。这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衍于厥身，诸侯莫不奔走，以祈王身”，与《礼记·郊特牲》“天子之失礼，自夷王以下”，所记完全相合，此铭文记事以夷王最适。而在铭文字句与词汇用法，夷王世也有证据，如“共”字写法，与两“其”字用为虚词。此鼎记伐昏，王不亲见、亲令，连“王若曰”代行王命的简单仪式都没有举行，这在西周金文中非常特殊，不仅与厉王暴厉，所作诸器铭骄横不可一世，悬若天渊，即与宣王令伐淮夷等战，气势、口吻、魄力也无法相比，全可排除。所以绝对年代断为夷王，先解最大争论，下分专论详举重要证据。

二、“广伐南国”究竟是谁？和伐昏是何关系？和周公究有何牵涉？

（一）朱文题目已综括为《柞伯鼎与周公东征》，“广伐南国”已确定就是周公，牵涉周初开国历史与许多战争方位。这是一个关系很大、也是铭文一个根本的问题。按我反复研究，全铭

中心就是记虢仲（仲）令柞伯率蔡侯围伐昏及其胜利结果，与已过了十代的周公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要伐昏，不能没有原因。据我研究西周战争，征伐起因可以分为数类，其中最主要、最多的一类，就是不服周统治，反周，或不断叛乱，进行反抗，周称为“反”、“大反”、“反夷”。除个别在北方外，最初皆为东夷，成为灭殷后周之大敌，周多次遣将派兵。中期及以后始出现南国的战争。“广伐南国”就是虢仲向柞伯交代伐昏国原因，“广伐南国”者根本不是周公，而就是昏。铭文本身已有交代，“用昏无及”，“用”就是“因”，昏就是下文所伐的昏邑。这是一个小国，铭文虽未称为昏国，而国与都同名。我很早就提出《城、国同源论》，最初一国就是以一城为都，向外扩展，春秋以城名国，城、国同名，还很多见。鼎铭称“昏邑”即是以城为都，表国，正可互证。但是朱文用通假将“昏”字读为“愍”，“努力、尽力之意”，大意是说，周公致力于周邦，而其勤勉无人可及，是指周公。周公下距厉、宣时代已经十世，据拙文《西周战争与民族历史地理考古研究》，西周初期战争，包括全部有关周公文，根本没有征伐南国，只有东国。铭文如何能上溯十世之周公，系联为一，而把“广伐南国”作为周公领导的战争？不仅没有任何证据，且只有否定的反证，南国与南夷对别，指的是周的国土，而不是夷族之地，实在无法解释为周公“广伐南国”。

（二）“用昏无及”根本不是朱文所说周公无人可及之功，而是说昏敢“广伐南国”之罪。至于虢仲令柞伯伐昏，上溯周公，则是因柞伯是周公之后，所以让他率蔡侯伐昏国，在当时就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首先，因是周公之后之故，因昏“广伐南国”，必须伐昏且一定要成功，无负厚望与祖周公先德。朱文解为周公，战争对象逆转变为相反，由昏反周之反面战争，变为周正面的征伐，真相就全改换，性质完全不同。

（三）昏“广伐南国”对周不是件小事，必须命将征伐重惩，一般都要有正式王命或代宣典礼，兵马人数也不能过少，以保证胜利，宣示周之威德永扬。所以一开始都大张旗鼓，宣扬声势，为战争胜利鼓动，制造将士战斗气氛，加强必胜信心。战争最后目的都是为政治与统治需

要，不成就是表统治失败。但是此铭伐昏，与西周战争很不相同，战前几乎没有做多少工作。1. 周天子连招见柞伯、亲自面令或代宣王命的仪式都不能举行，皆由虢仲下令执行，只能是有病在身的夷王。2. 虢仲令柞伯率蔡侯伐昏邑，而由柞、蔡二国左至于昏邑，并未说周出兵，似乎就是依靠柞蔡二国出兵，主帅就是柞伯，蔡侯佐之为副，周仅由虢仲作为周王室的代表，居于最上主持吩咐而已，这也是前所未见之事。3. 铭文记柞伯战功，仅割十首，俘二人，人数之少，也为金文仅见，因系柞国纪功鼎铭，不记王师、周师、战功等等。但是由铭文已有记事，可以由表及里，查明真相。查究为何原因、经过等，多在鼎铭之外，牵涉多而又很复杂，留下专论。

（四）由宗庙祭祀产生宗族、宗法礼制，是中国特有的早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决定性标志，经历夏商周三代成为上层血缘纽带政治依靠与下层社会家族、宗族长期联合的基础。周初封建诸侯，统治天下，分封同姓，以藩屏周，而皆按宗族血缘亲疏，分别爵位高低、地方大小、远近等级。这是周公所定周礼制度基础，用为统治新得的东国、南国政权的依靠。虢仲令柞伯时提出周公有共于周邦，盖因柞为周公之后，很被周重视。1993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出土柞伯簋^①，铭文称柞伯因参加王大射礼，十射皆中，获赤金十反（版），“用作周公宝尊彝”。我在《柞伯簋学宫制度与小子、小臣来源、身分新考》一文中，考明“王曰小子、小臣”，小子原称王族子弟，小臣则称王宫侍奉近臣，大抵选自近亲，依靠血缘亲近，为周王室服务。而设学宫辟雍，教育贵族子弟、近臣，作为主要对象。柞伯为周公子孙，属于小子，故与小臣等一同在周都学宫学礼、学射。而静簋“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学射”，主要就是小子、小臣，包括侍卫官吏。以上究明了西周学宫教育制度、生员来源，与小子、小臣身分的渊源关系。柞伯称伯，已为柞国之君，而仍被召来学宫学礼、学射，说明周初对王族子弟教育培训何等重视。射、御皆为战争必需，依靠王族、近臣学习应用，以捍卫、巩固周朝政权统治。柞伯簋出于应墓，也因应与周血缘亲密的关系。而入春秋皆不见，王龙正等《柞伯簋铭文考释》，引《左传》成十二年，晋、楚盟于宋曰“有渝此盟……无克胙国”，认为此时柞国尚存。但此胙

明为动词“福胙”，不能误解为国名。晚清传世邾友父鬲，铭文“邾友父媵其子胙枣（曹）宝鬲”，杨树达解为曹姓邾国君友父嫁女于胙国所作媵器^②。杜预《春秋时族谱》邾“夷父颜有功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郕，曾孙郕犁来始见春秋，附从齐桓以尊周室”。按《春秋》庄五年经“郕犁来来朝”，友父为其尊祖，即此鬲友父，必在西周晚期。据《大系》图288，此鬲形制为无耳，宽平沿，带扉棱，三牛足，兽面饰，与三门峡虢墓出虢文公、虢季氏、虢季三鬲相同，确定为西周末期。在春秋之前，与柞国通婚，柞国东迁后不见，否则更近东周都王城与成周，必为周倚用，协佐周室，一如西周，至少不能毫无交往，春秋没有柞国，更为确证。

（五）蔡在淮水上，侯爵比柞伯大，但不令蔡侯为主帅。蔡始封蔡叔度与管叔挟武丁作乱，周公杀管叔，放蔡叔，其子胡周公用之，后复封蔡，故蔡后与周关系不能与周公之后柞伯相比。周初分封最南可至汉江、淮河北，所谓“巴、朴、楚、邓，吾南土也”，但皆为异姓，而接受周封爵，成为周属国。昭王两次征楚，即为其不贡。玉戈铭有戍汉，为周南国极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即汉北所封姬姓国不断为楚吞灭，包括淮河以南国，地远国小，周无力保护，无法自存，被淮夷发展占据，更南近汉江北，则被楚灭。驹父盨记宣王时于蔡驻南诸侯师以防淮夷小大邦，昏即属于淮夷，所以广伐周南国就是在蔡防线南的淮河中游一带。昏当更近蔡，而柞在北稍远，但与周血缘最亲就是柞，其次就是蔡，所以虢仲利用柞、蔡以为开路先锋。此时淮河中游姬姓诸国几多不存，更无大国，所以虢仲令柞伯率蔡侯，尽管只作左翼，左至于昏邑，主力与总帅还是虢仲，最后右至昏开始总攻决战，并非专依靠柞、蔡两国。只是柞伯战绩极微，说明此时国小、兵少，虽未记蔡侯与虢仲战绩，总的说来此次西周王室战争收获甚小，所伤昏邑仅为皮毛，未触根本。不管怎样说，一个小邑昏国，周还不能独立征伐，这可能因夷王患病而受影响，但关键还在于人、财、物力缺乏，经济与物质基础的退化、衰弱，导致西周最后衰亡，这是根本问题所在。但仅儒家礼经记载，周衰始于夷王，而语焉不详，司马迁及其后史书皆只字未说，更不知情况，现由柞伯鼎铭反映当时真况，正确无疑。这是西周统治由兴转衰的重要证据。

此证据唯一为鼎铭提供，而非考古所能发掘出来，所以价值极大，无可取代。此仅揭要，另详专文。

三、“广伐南国”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

柞伯鼎记前后二次战争，实因两者有因果关系。“广伐南国”就是虢仲命柞伯伐昏时说明为何伐昏的原因；提出周公，是因柞伯是周公之后，故委此重任。这与已过十世的周公东征毫无任何瓜葛，该铭文本身就有决定性证据，无需外求，辨正如下：

（一）“用昏无及”。“昏”即是下文之昏，同指昏国。朱文说，昏“当读为暨”，解为周公“勤勉无人可及”，利用辗转通假，结果就把原来非常明确清楚的关系，完全弄反了。此句是说昏之罪，紧接“广伐南国”，就是指昏，非常明确。“用”在金文常有“以”或“因”意，而“以、因”之意又常互通。《经籍纂诂》“用”字下，其意繁多，但是第一条就是“以也”。《一切经音义》卷七引《仓颉》，而“以”常训“因”。此句“用”就是“因”。多友鼎（《集成》2835）“用严允放兴，广伐京师”，“用”与此句用法、用意完全相同，彻底解决两者都是表因果句之“因”，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曲解。“无及”就是说昏国肆无忌惮。而“广伐南国”，根本不是讲周公，而是指昏国，所以要派柞伯率蔡侯伐昏。两个“昏”字完全一样，都是同一个昏国。朱文分为不同两字，而用通假解第一个昏为暨字，变为另一个人，另一件事，铭文解释就全不同，导致面貌皆变，不能不予辨明。

（二）“广伐南国”。“广伐”屡见西周金文，除上引多友鼎外，他如师密簋“南夷肤虎……广伐东国”，禹鼎（《集成》2834）“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不期簋（《集成》）“严允广伐西俞”。1979年，我在《多友鼎铭年代与战争历史地理考释》^③已经指出“广伐”之“广”与“横”皆从“黄”声，同“横行天下”之“横”，而不是广阔之“广”，横逆、横蛮、凶横等都是贬义词。朱文说“广伐当言征战区域广阔”，这是按后世汉语之“广”解释西周金文，是造成把“广伐南国”者当作周公的误失根源所在。多友鼎“严允放兴”与下文“广伐”并举，朱文解“放”为“方”，其实这个“放”义同于“横”，可以互证广伐之

“广”同“放”，不能用通假解释为“方”而失原意。我已确考西周金文所有“广伐”全皆限于反周、伐周的敌方，绝对不用于自方。不期簋“广伐”限于严允，下文称“女以我车宕伐允于高陵”，立即改为“宕伐”。郭沫若《大系考释》解“广伐犹博伐”，“下复言宕伐亦同义”。王国维亦用宕伐为解。“广伐”实在只用于贬义词，不能用于周公，褒义只能称“宕伐”，而为王、郭二大师所不知。词义有褒贬，就有正反区别。铭文用“广伐”明确为贬义，确证昏国所伐。贬褒词义正反不同，错解就结果全相反了。

(三) “无及”也必然是贬义，但不见周以后任何记载，当是西周口头成语。西周金文有“无极”，后尚用于汉代瓦当“与天无极”，用于褒义，表没有穷极意，与此词不同。此词并无穷极义，不能解为“无人可及”，其义近于“无忌”，而表贬意，表昏“肆无忌惮”。“忌”(gie)与“及”(giep)，上古音分属之与缉韵，声纽皆同，仅为去、入声之分，即有无收尾声之异，正是同音互假。真正的通假，我主张限于同音。至汉传抄经籍，今古文仍皆使用同声之字，故可定为原则，其他通假必须从严。

(四) 《上海博物馆馆刊》第十期刊布2000年入藏的西周后期鼎铭有：

“用南夷□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令应侯见工曰：征伐□□□□伐南夷。□□多孚，余用作朕烈考武侯尊鼎”(下略)。

南国明确与南夷对别，指周国土，南夷则为敌族，“广伐南国”皆表敌族，用“广伐”贬词，而周自称则用“征伐”，对比明显。“敢作非良”与此鼎“无及”，皆为斥责之词。开首“用”为“因为”义，与此鼎铭“用昏无及”用法全同，彼此互证，成为多重证据。“广伐南国”绝对不是周公，唯一就是昏国，可以定论。

(五) 虢仲令柞伯“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主帅似是柞伯，而以蔡侯佐之为副。朱文以为虢仲，颇具识见。由于鼎铭并未说虢仲就是主帅，无其他铭文实据可凭，不能仅依表象推断，应拿出战争事实诸证。朱文仅凭“铭文言及虢仲柞伯蔡侯三人”，说“虢仲作为主帅也应以所辖(虢国)师旅与柞蔡的兵力协同投入战斗”。但是铭文只字未说虢仲任何战斗情况与实物的战绩、胜利收获，还是难以取信于人。更为主要的

是，虢仲开头就讲周公，实是周执政者代王行令，用王室身份甚明。朱文以此推断虢仲封于荥阳东虢，与柞、蔡相近容易会师作为理由。虢仲实在不是、也不能以平等的虢国发号施令令柞伯，这不合理，不能成立。我也肯定主帅确为虢仲，根据铭文已记事实，至少证据有三：一是虢仲令柞伯，只令他率蔡侯“左至于昏邑”，首先柞伯不是全面攻昏主帅，从下令他任务时就已有明确的表示；二是先有“左至昏邑”，必有右至，就是后至昏邑的虢仲，明确皆为虢仲作战部署的具体措施。类似之例可为互证者，还有1986年安康出土史密簋，记“伐南夷肤虎”，有“师俗帅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夔伯、棘□，周伐长必”。周伐就是围伐，师俗从左，史密从右，合围长必^④。证明同于鼎铭“左至”，虢仲后至，就是右至，而等他最后至才下令总攻，所以就是主帅无疑；三是虢仲既是战争决定者，也是前后主持者，柞伯完全听命于他，谁是主帅？无需废词。

(六) 最后还有两项要事，朱文未说，不能不阐明：一是铭文只记“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战果之微实为金文战争仅见者。但又不记虢仲博戎情况，鼎为柞伯纪功，限记柞伯。史密簋也只记史密战果，不记师俗，尽管师俗也是第一主帅，战果不应比史密少，而皆同为体裁和字数所限，可为二重互证。二是这次伐昏之战是周王室征伐昏，柞伯与蔡侯只是周分派任务，不仅主帅为虢仲，主力也是王师而由虢仲最后率领右至昏，与左至柞伯蔡侯合围。而柞伯仅获十首二人，充分说明其不是主力，仅为配合而已。主力必为虢仲率领后至周师，但不是虢国之兵，绝不可能单人匹马，而独赴战场博戎，只是带人马多少而已，至少必带一队卫兵，也不能一无所获。但是总的战争安排、主持与具体指挥决战，前后事实明确，铭文无只字交代，而又无其他记载、物证，只能就铭文已记事实反复论证明确，否则就将永成不解疑案。

四 “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对别，不是夷土地

(一) 鼎铭“广伐南国”，朱文定为周公，将南国定为周土外诸国，并特设“西周南国之地理范围”一节，论证此一观点，最后结论为“淮水流域皆属南国……所以西周金文将南国与南淮夷相联系”，并引用禹鼎与《诗·大雅》

“南国”等，以为证明。首先就是混合南国、南夷为一，不分周土与夷土有敌我之别，导致诸多误解。西周早期淮河流域主要为淮夷，仅北部为周南国，并不存在问题。周公并无南征，更不能将周土“南国”以称异族，后者皆只称为夷，不能称为国，南国表周国土。朱文引禹鼎“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国与夷对别，东国、南国指周国内领土，南夷、东夷则是称以外不服周的异族，本身已是朱文反证。上文已证“用昏无及”是说昏肆无忌惮，而敢伐南国。“广伐”又是贬义词。首先要分清是在周国土内管辖邦国，还是在管辖以外异族之地？淮河流域直至春秋、战国，下游还多属淮夷或南夷之地，叛服无常。由于周日益向东南扩展，驱赶、降服东夷、南夷，占领、统治其地，人民不断融合，成为汉族最早一个来源，亦即最早的中原文明与汉族形成的总过程。

（二）南国是一个地理名称，但包含有政治因素在内。一因政治立场不同，限定所指地区概念与范围、内涵就会完全相反；二因时代不同，也有范围发展、变迁与概念背景差异。南国是周国土，而与周敌族南夷有别，西周金文、文献都有大量证据，朱文也皆举以证南国地理范围。文献多于金文数倍，朱文所举仅为少数。最早为《诗·大雅·嵩高》，“南国是式”，同一篇既称“南国”，又屡称“南邦”、“南土”，确证西周南国就是周土，无法误解为境外何国之地。《常武》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惠此南国”，下文皆记平定不庭的徐方，“……戒我师旅，率彼淮浦……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再次互证南国是周南土，而与南夷之徐方敌我有别。朱文引《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此诗与《大雅·江汉》皆记宣王征服淮夷，文句多同，互接。《江汉》开首“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下一再称“淮夷来求……淮夷来铺”。昭王渡汉征楚未成，至宣王伐淮夷，“江汉之浒，王召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而“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成为“南国之纪”。南国就是王国一部分，而被诗人宣扬夸大为“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但周南国确至江汉之浒，所以《四月》诗称“南国之纪”，下紧接“尽瘁以仕，宁莫我有”，说明“南国之纪”设官管理新降服归顺诸南淮夷，而作诗者正仕于此南国，地广事

多，需尽瘁才能完成。袁盘、兮甲盘，都记淮夷要交实物赋税，不交即不服，故派将征伐。十八年驹父盨记征收淮夷小大邦服物，皆为宣王。以前淮河流域并非皆属周南国，部分属淮夷或南夷，还常“广伐南国”，多至四见。此鼎为夷王世，余为厉王世或宣王前。而过去对南国、南夷多未查明，混淆不分，产生重大误解。

但西周南国不断发展，将东夷、淮夷驱赶，地区范围皆有变迁。夷地变服属周土，而皆叛服无常，极为纠葛。这也是南国、南夷误混不清的根源所在，必需溯流穷源，讲清其来龙去脉。更为关键的是，朱文将“广伐南国”定为周公，专设“关于周公南征”，予以论定，并说“周公这一事迹是西周金文中首次见到的，对于西周史研究具有极重要价值”。但是周初金文与文献只有东征，“但周公是否曾南征”，朱文说“在西周文字中虽有涉及，但讲的并不明确，在周文献中似只有《荀子·王制》讲到‘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来迟也’”。按此明为荀子假设之词，根本不是周史，荀子也并非说历史，不能作为证明。周公有无南征，不仅关系周重大史实，也是此鼎铭一个根本问题，能否如朱文所说“金文首见，具有极重要价值”，按我考查，实都没有，或不可能存在。这就必需认真查明，彻底清除两大纠葛。

周以小邦灭大国殷，收为周土。一是殷本土，二是殷东方地区，包括臣服、半臣服、名义臣服，或反复无常，并未臣服，如人方等。周得于殷，比之周本土至少要大数倍。武王伐殷，仅克纣于殷都，其他皆未解决。首先就是殷本土，再则为殷东方之地。《逸周书·作洛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毛父宇于东”，分别称殷与东对别。同篇又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也将三叔之殷与殷东对别，而更将殷东地域、国、族进一步明确。传出洛阳唐寺门的保尊、卣记“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被定为武王与分封五侯，我考证“及”本义象追捕抓人，甲骨文与西周前期金文皆用为动词本义^⑤，如果解为连词，首先就是甲骨文及金文前期语法不能允许，而又不说“令”保去做什么，岂能猜谜？更是违反常识。五侯即“太公封于齐兼五侯地”，《汉书·地理志》：“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正是五国，即保尊“殷东国五侯”，如合契符。武王克殷后即有病，两年即死，无再征

伐之事。《周本纪》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而告周公……顾瞻有河……洛伊，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就是为此忧虑不寐，而要定都黄河中下游、伊洛河上洛邑，就是为解决殷与其东诸地。周一开国及以后数代，都用全力解决对东国统治。周公只有东征，因巴（蜀）、濮，早就参加武王之八国伐纣，楚也早附于周，不存在任何战争需要，周公南征就只能是“莫须有”。何尊“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数千年不明的是否迁都，铭文争论关键的“迁”字，已由大盂鼎“亟口迁自厥土”佐证，两“迁”字写法用法全同，铁定迁宅于成周，就是为统治以东之东国。何尊确记成王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周公营洛邑，成王初迁成周，就是按武王廷告，为解决再灭殷后周王朝能否持续存在，殷与殷东（合称东国）能否永远作为周东方国土。而其中又有人方（即夷方），就是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者，既不服殷，也不服周，正是所谓“殷鉴不远”，所以成为西周前期最主要征伐地区，对象就是东夷。直到穆王世的班簋“伐东国厌（奄或偃。或释骨，但无此族、国，似非是）戎”，“三年静东国”。东国是周国土，厌戎则属东夷，还是最大重点战争的对象。东国的东夷，一是被战争征服，归顺受周封爵，为东国属国，春秋还有不少存在。二是拒绝臣周，反抗到底，或先服后反，称为“反夷”，只能用战争，向东驱赶，迫使其不断退到海滨、海岛。如“营丘边莱，莱人夷也……而与（齐）太公争国”，后被齐不断驱逐、分化，部分臣服，部分不服者最后迁于海滨，最后皆为齐灭。后代分别置东莱郡、莱州、蓬莱等郡、州、县，都是因莱族迁居于此得名。小臣逯簋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伐海眉……承王令赐师率征自五隅贝”，正是成王灭殷后征东夷，远至海眉，即海岸。五隅就是海角，亦即《尚书·尧典》的“宅隅夷”，《禹贡》青州“隅夷既略”，为隅夷最早所居诸地区之一。1973~1975年，山东省长岛县王沟村西周至战国墓葬出土一些铜器，一舟底有一甗形徽识，确证为东夷族徽之类，无疑为周或齐多次征伐，被迫由海隅迁入海岛者。三是大量被迫南迁到淮河流域与其河口三角州上，与淮夷杂居，一同被称为淮夷、南淮夷、南夷。西周后期，金文所记战争不见东征与东夷，就是由于东夷南迁淮上，不

断加入淮夷、南夷后，被周总称为淮夷。日久族多人众，人口成倍增加，而皆在周南国之外，沃土已为周分封占领，淮夷族多、地狭，生活土地有限，必须向外大量扩展，与周争夺土地财物，成为西周后期成周大患，所以战争只有南夷、淮夷，没有东夷。按下文考证，昏就是迁居淮上成为淮夷，为何要广伐南国？正是同于上述情况。所以详细阐明其源流演变，才能获解。

周初称为“殷东国”，确证自殷，东夷即殷人方，既不服殷，也不服周。周用封建诸侯，分别统治，最大设齐、鲁为东国两大柱梁，齐有莱夷与蒲姑，鲁有奄与淮夷、徐戎，皆被驱逐。还有一些归顺，接受周封，成为周东国属国，最著名的就是“任、宿、须句、颛臾，封姓也”之四国，“实司太昊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我已考明，宿最早服殷，“司有济之祀”，实为周封。苏钟记宣王巡狩东国，发现宿不服，而伐宿，最为确证。东夷不少反抗，周称为“反夷”或“东反夷”，就是先服后反。周初殷本土外的东方之地皆称东国，东至海，东南至淮，为周统治国土，臣服者封爵，不服或反周则征伐驱逐。总之，东国就是周土，人民原多为东夷，臣服于周后，与周人共处，为周臣民，经周不断融合成为最早汉族的一个源头。但中有反复无常者或“反夷”，成为周前期最大征伐驱逐对象，其多南迁淮河流域变为南夷，而与南国对别。此种情况周初还都未出现，故没有南征，不仅周公。旧皆不考东国、东夷源流，不得不详证。

（三）最早出现南国与南征是在昭王末期，《竹书纪年》记有昭王十六年与十九年二次，金文明确记“省南国”已知有三篇：一是中方鼎，“维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王居”；二是同人同时所作中鬲，“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三是静方鼎，“王在宗周，令师中泊静省南国，设居”，师中即中。皆为同时王令，应即昭王十六年伐楚。南国都是指周国土内南部地方，省即巡视，贯行即开路，设居即建王行宫，都只能限于国土，不能在夷地内。1902年岐山出土玉戈，“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出殷南，命厉侯辟，用蛛走百人”，也是巡视国土，但非进行战争。太保如为召公则为康世，如为另一后继者，就是昭世。所省南国也只能为周国土，不能为夷地甚明。昭王为何要伐楚？并非因楚伐

周，主要是楚不贡，就是不臣于周。《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管仲对楚使问为何罪，第一条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证明楚贡于周，直至春秋不变。周原甲骨有四片有楚，其中“今秋楚子来告……”，“其微、楚升燎，师氏受燎”，证明楚参加周会盟祭天，并献了礼。《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鬻父、禽父共事康王”，更予确证。至于管仲第二条问罪为“昭王南征而不复”，楚使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拒不认罪。杜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西周南国之境至于汉水，楚越汉而北始于楚武王，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不仅周公没有南征，昭王十六年以前南征，全皆乌有，“广伐南国”为周南土，定为周公更属无稽。

（四）虢仲令柞伯伐昏，就是因昏“广伐南国”。南国是在周境内周之诸国，不是境外任何夷族之地。南国与南夷所指地域完全相反，这是首先必须查明分清的，否则敌我不分。西周南国与东国从何处划分？原则上成周以东为东国，宗周、成周王畿南部为周南国。《左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唐兰先生已指出陕是郑郛之误。周灭殷以后，东国就是经营征伐的重要对象，所以由周公主持，这是非常可信的。宗周钟记厉王巡狩，“王诰省文武，觐疆土”，即视察文武开创的疆土，后世巡边之始，从而发现“南国服子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证明南国指王畿南部。“巴、濮、楚、邓”，都在成周之南，厉王就是巡宗周与成周南国而至成周，途中发现服子陷处周土，确证南国为周之地，而称“南国”，与下文称“南夷、东夷”相对区别。晋侯苏钟开首就记“王亲诰省东国、南国”，诰省即巡狩，“王步自宗周”，先巡南国，格于成周后，“王馈往东”，再巡东国。南国为宗周至成周王畿南部之地，东国则为自成周以东周地，至为明确^⑥。其中有臣服而受周封的夷族之国，如夙夷，巡狩发现不服，故予征伐，可为互证。这里只是举例，不再详说。总之，最早就是以宗周、成周王畿南部，与成周往东的周土，分称南国、东国，与夷相区别。师袁簋“淮夷……弗速（迹）我东国”，明称为“我”，就是周土铁证。至于明公簋“遣三族伐东国”，上文特证周初东国承殷，此簋“伐

东国”就是指东国内东夷，来自人方。东国、南国皆作为周国土，虽中可有叛服无常夷族，但仅为国土内部之事，不能改变其为国土性质，或否定与夷对别。所以“广伐南国”只能为昏国伐周之地，绝对不能是周公征伐周之国土，更不能用贬词“广伐”。这是鼎铭根本问题，一反一正就有天渊之别，所以反复辨明。只是南国随军事、政治与时代发展而有不同，本文限谈铭文中的城、国地理问题。朱文引“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南国、东国明为周之国土，而南淮夷、东夷则在其外，不属于周之夷族，朱文已经自提确证，点出就明。

（五）至于经籍记载，朱文举《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是纪”，用以证明南国地理范围，仍混周土与夷地为一。上文已略引《诗》“南国”，不全，现为彻底解疑释惑，必须将先秦记载所能查明者全引，以确考南国皆为周南土，而非属南夷之地。首先，与西周晚期金文同时的《诗》大小雅更清楚。最为明确就是《大雅·嵩高》所记最多，全引于下：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矣）王舅，南土是保。”

“南国”下文又三次换称为“南土”，两称“南邦”，就是周土、周邦铁证，毛传早解“谢，周之南国也”，所以封申伯于此。

二是《常武》互为二重证据：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下文多次称“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徐方来廷，徐方不回，王曰还归”，即迫使徐方臣于周后，凯旋而还。周初“淮夷、徐戎并兴”。原居曲阜郊地故来与鲁争地，一如莱夷与齐争地，战败被驱徙徐地，在淮河北自立为一国，与淮夷地域相接，文化、人民不尽同，故被周称为徐戎。至周穆王时徐复兴称王，再与周争天下。徐在淮河之北，介于东夷与淮夷之间。徐国文化高于淮夷，但徐偃王后为周征服，徐受周封爵称为徐子，多见《左传》。徐为东夷最早用汉字者，造作大量金文，与较早接受周、鲁文化影响不无关系。郑玄于“惠此南国”下笺“以惠淮浦之旁国”，亦即周之属国、属地，否则就不能

称惠,“惠”字成为周土决定证据。

西周后金文无南国,以后文献仅见《国语·周语》(上)记西周事,“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败于姜戎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史记》将《国语》全写入《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南国,南阳也。”申、谢皆在南阳,分别见《汉书地理志》与《续志》,正即周之南土。此外《礼记·乐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此为战国所记大武乐舞表演西周历史剧,三成、四成都是表灭商以后,向南奠定周之南国疆土,包括南土之“巴濮楚邓”,都受周封爵。所以说“南国是疆”,也是战国儒家最晚仍将南国作为周疆土的确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就是周初“南国是疆”时,南至汉水为界,分封姬姓诸国,但都不是使用战争。东国、南国主要为西周所称,周东迁后,皆有多种分化,基本不属周王朝直接统治,所以其名就不再用了。春秋齐、鲁为东方两个最大国,不断兼并周围地区诸多东夷族国家,不断融入华夏族,最后共同形成汉族而为其最早的一个源头。文明求源首先就是要求中国形成的地域与民族之源,地域包括夏之黄河中游武王所称之“中国”,与向南包括淮河流域,形成的中原地区最早文明,由夷夏并立的华夏族与东夷、淮夷共同创造。齐鲁主要向南扩展,包括淮、泗下游诸国、族。《鲁颂·闭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鳧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傅斯年最早提出《大东、小东说》,如同西方之称远东、近东。但他限于当时所知,未能利用大量地下出土的殷周甲骨金文资料。殷周甲骨金文中征人方,特别是与西周相始终的多篇金文,涉及征伐东夷、南夷、淮夷、南淮夷,向东与东南多次的发展,而使东方众多夷族迁移,发生地域变迁与地理概念的变化,拙文皆予详证。简括地说,小东就是周灭殷后的殷东国基础,最早分封齐、鲁两大柱梁作为中心,与归顺周的国、族,而形成周初期东国;大东则是后期向东与向南扩大。而《鲁颂·闭宫》明记鲁征服徐方、淮夷,称为“南夷”,《大雅·江汉》,《常武》分别歌颂宣王有“淮夷来辅”,与“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而征服徐方。宣王已荒大东,扩展到淮河下游,而与兮甲盘、驹父盨等铭

互证。淮夷小、大邦向周交赋,而服于周,只是叛服无常。包括鲁僖公征服徐方、淮夷,必皆此前又叛,此后也不属鲁,仅为一时而已^⑦。但至战国“淮泗之夷散为民户”,早在秦统一前已融为汉族,共同创造最早中原文明,成为汉族的最早一个源头。秦统一以后,江汉流域之楚与江浙流域之吴越融为汉族,故皆远在其后。

以上将西周金文与有关东国、南国记载全予查明落实,就是为确证东国、南国都为周之国土,非夷族之地。过去对南国、南夷的历史与地理发展变迁过程,缺乏由表及里的研究,仅看表面相似。所以就是要溯流穷源,彻底查明真相,斩除有关纠葛。从夷夏并立开始,直至西周,不断扩展东国、南国土地,驱占东夷、淮夷之地,南包淮河流域,形成中原地区(晋文公对楚子问“晋楚构兵遇于中原”,即指黄、淮河中游)文明,东夷、淮夷不断融合为汉族,成为中国文明最早、也是最大形成、扩展中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昏在何地?究为何族?原地何在?迁徙原因?

(一) 鼎铭中昏的地望: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

昏未留任何记载与考古遗物,唯一就是与柞、蔡相近,据以考订昏的相对方位、源流。

1.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凡、蒋、邢、毛、柞、祭,周公之胤也”,柞杜注“燕县西南有柞亭”。《后汉书·郡国志》:“东郡有柞城,古柞国”。《水经·济水注》:濮水“又东经柞亭东注,故柞国也”,扬守敬《水经(济水)注疏》引杜注“在今延津县庞固社”。乾隆《一统志》:“柞城故城在延津县北三十五里,周为柞国”。《中国历史地图集》州县定位,基本就是依据清《一统志》所记古城方里,将柞标于延津北。最近看到《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7日刊登《河南延津沙门城址考古收获》,在延津西北榆林乡沙门村东北15公里,发现古代黄河南岸重要渡口,城墙为战国时代,前身或即是柞国,至少与柞相近。这使我追忆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历次会议,数次提出应尽可能利用考古定位,如缺才用方志古城。当时受限,今后已有条件利用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微宏观考察三结合定位予以重编,以提高科学研究与应用价值。柞国当黄河之南渡口,因黄河摆动有所变

动。今柘城县乃金元河道迁徙，州、县治皆改迁，明依记载于其附近所建，非古柘国城。今后按清地志所提勘查柘国故址，可能找到。总之柘国方位基本明确，即在延津北，古黄河南，最早津渡口，南接淮河流域支流。

2. 蔡正在淮河流域中游汝水之上，今上蔡前身，一直在此未变。蔡故城仍在上蔡城外，最为明确。昏广伐南国，其必在成周王畿南国之南，亦即在淮河流域中游蔡国以南。上蔡及其北基本为周南国之地，故昏被彻底排除在蔡之北。

3.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扞、晋、应、韩，武之穆也”。应国墓地已在平顶山市发现，应公、应监、应侯皆见于西周金文，为周依用。柘伯簋即出于应墓，柘、应与周关系皆在蔡之上。西周蔡国与周交往第一次见于此鼎。上海博物馆藏蔡侯作姬单媵匜，被定为西周晚期，但是器形介于东西周之间，字体尚待细考。除此外，蔡器时代皆为春秋，说明蔡在西周不显，地位也不重要。蔡为周依用，始见此鼎。而不用既近成周，又早就屡为周用之应，说明蔡近于昏，由柘伯率领，以为其副。昏必去应远而方位不合。以前伯雍父等驻于淮河北的胡、叶以防淮夷，甚近应国。宣王十八年，南诸侯帅师驻蔡，当与此次伐昏蔡起作用有关，改驻蔡以管制淮夷。引证于下，对广伐南国的昏的方位至少可供参考。

4. 驹父盨记“南仲邦父命驹父簋（即）南诸侯率（帅）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还至于蔡”，就是为镇抚淮夷，收取服贡。“至于淮夷小大邦，无敢不口，具逆王命”。昏必与蔡近，昏伐南国为淮河流域周土，即成周之南畿。昏就是周南国之外的淮夷，在成周南畿之外、淮河上中游之南，唯一见于此鼎铭，春秋不见，亡于东迁时。现只知至此。

（二）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

西周前期金文战争皆为征伐东国之东夷，后期基本为淮夷战争取代。东夷何以不见？唯一就是因被周不断东伐，南迁淮上，合于淮夷，地瘠且狭，而国、族日多，人满为患，从而不断与周争夺土地、财物。杜预《春秋释例》卷七〔夷地〕：“僖十三年，淮夷，东夷”，下注“东夷居淮水者，缺”，就是南迁淮上。按此为《左传》僖十三年“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杜预最早指出此淮夷原是东夷南迁，后居淮水，所说甚

是，而未说所据。考《左传》记当时东夷凡八见，淮夷四见，明分为二。淮夷以居于淮河流域得名。东夷原在其北的黄河下游，即周最东部的山东半岛中心地区，东尽海滨，东南达于淮河入海口，以北为东夷长期所住。以南淮河流域，周称为淮夷、南淮夷、南夷，但是民族分布、迁徙疆域并不固定，随军事政治发展以及时间变化而不同，只能大致而言如此。

（三）淮夷与东夷的演变关系，至春秋时期发展的过程

《诗经·小雅·大东》“小东、大东”，《鲁颂·闭宫》“遂荒大东”，东国后发展为小、大东国。春秋鲁僖公时，大东已扩展“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成为海邦的淮夷。而自人方与殷对抗并立，周东国承殷，除一部分受周封爵归顺外，大部分被称为东夷，就是拒绝接受周统治，被周多次征伐，不断驱逐，被迫迁徙，最东至海，南则到淮上，与淮夷合一。杜预称“淮夷，东夷居淮水者”就是指此。《左传》哀十九年“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杜注“从越之夷三种，东夷也”。春秋后期，东夷更越淮河南，至江浙海口三角州吴越之境。《左传》八记东夷，与鲁、齐关系各一次，皆在前期，后期六次，证明曾为楚征服。文五年，“楚公子朱自东夷即陈”，必已属楚。襄元年，“晋降彭城，而归于宋，楚失东夷”。昭四年，楚子（灵王）第一次会盟黄河以南及淮河内外诸侯于申，随即伐吴，淮夷皆列最后，也是第一次附楚。胡渭《禹贡锥指》卷六谓“此皆淮南之夷在扬州之域者”，即已接吴境。次年再会伐吴为其继续，但以东夷列最后，取代淮夷，也是东夷最晚出现的唯一记载，证明二者原来是一。东夷不断南迁于淮河南北，直至长江。杜预注“淮夷，东夷居淮水者”，就是他长期研究《春秋左传》所得结果。过程比较复杂，一言难尽，只能出如此结论。

（四）昏就是东夷，南徙居淮水上，记载与金文互证

《春秋》僖十三年《经》：“公会齐侯（及诸侯）……于碱”，《传》：“夏会于碱，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旧皆依杜注“碱，卫地，东郡濮阳东南有碱城”。按文十一年《经》“（鲁）叔孙得臣败狄于碱”，实为鲁地，今纠其误。与会于此以救杞最合，西周后期杞已迁于东

国，此地近杞故。次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杜注“缘陵，杞邑，避淮夷迁都”。或据《管子·大匡》、《霸形》以缘陵为齐地，但与杞都相距不能过远，春秋皆在东国。而远处淮上的淮夷为何要病东国之杞？旧所未解，唯一就是因它原为东夷被迫南迁居淮，地为杞有，即杜注所据。武王灭商，封夏之后于杞，原在淮河流域，今之杞县前身。而史密簋已记杞在东国，《左传》襄十九年也记“杞，夏之余，而即东夷”。昏广伐南国，而与蔡、柞相近，必为南国附近之淮夷，或称南淮夷、南夷，但从不见任何记载，迁居昏邑必晚，国小只有一城。周封诸姬已至汉北，“楚尽有之”，即为楚灭，但昏未为楚并，就是因不在汉北，而在淮河上中游间，处于成周南畿外隙地之故，因地近，当为周并，而比较合乎情理。

（五）昏为何“广伐南国”？原因与目的

昏国小，人、地少而贫，“广伐南国”首先就是为生存需要，夺地，争人、畜、财产。另一原因就是原为东夷而迁居淮上，实被周驱逐至此，正与上述杜预所举相合，怀恨在心，不甘处此，企图报复，故反周。相似之例可以互证的，还有皆为西周晚期两件金文。其一吾鼎：

“王在成周，南淮夷遽及内，伐溟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吾追联于上洛析谷，至于伊班”。

北宋摹本未尽传真，“遽及”，《大系》释为“迁受”。“遽”明从辵从娄，即《说文》“遽，连遽也”，《集韵》“遽，连遽不绝貌”。即连续行走不断迁徙于内，即周畿内，最后溯淮而上，至伊洛河上游析谷，直攻成周，所以“王令吾追联于上洛”。“追”后一字《大系》释“御”，张亚初《引得》依裘锡圭释“拦”，实皆未识。我考明实“从辵，从丝”，《说文》无，最早收于顾野王《玉篇》，而为日僧空海抄要为《篆隶万象名义》，卷三十三有此字“补幸反”。字僻，北宋字书始收之，《集韵》有此字，“必幸切，行急也”，《类篇》同。（《集韵》另有“从井、从辵之字，‘一曰行急’，《类篇》‘又必幸切’，认为同字，《字汇补》同，但并不是同字，见空海书“遽”前第二字“彼争反，走散”，可以为联绵字。）“广伐南国”，除扩展领土外，就是为报复被周赶出，南夷反周有些就是与此密切相关。

其二史密簋：

“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合南夷肤虎会杞夷、舟夷、翟（鄣），不（丕）斫（近/进），广伐东国，齐师、族士、述（遂）人，乃执图（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又（右）率族人、釐伯、棘口，周伐长必，获百人……”

对象为肤虎，就是因其广伐东国，所以周师东征。有些论证将肤虎分为二，连征伐对象都混淆不清，明确是一岂能有二？但是何以又称它为南夷？已刊专文18篇都是谜。为何南夷要广伐东国，所会并不止一国，多至数国。周为何明令东征，却称为南夷？诸文对此都不能回答。已提出各说，多为误解附会。关键就在于不能理解肤虎为原在东国之夷族，而被周征伐南徙，成为南夷。所以广伐东国，除了报复外，就是为返取故地长必。它所会合的杞夷、舟夷，皆在东国。杞尤为明确，而称为夷，就是被其会合，结成为一伙，一同参加的证明。“广伐东国”的齐师、族士、遂人，明称为“东国”，皆为周土属国，而与南夷区别开来，可为确证。师俗、史密率齐师、莱伯等左右包围肤虎的长必，也正在东国，证明它最后确返居故地，也就是它广伐东国的原因、目的所在。但是又被称为南夷，证明它是被周人征伐所驱，逐步南迁。所伐齐师、族士、遂人，当因它的故地多被他们瓜分、占据，故予以报复。唯有如此解释才能完全通读，从而可与此鼎铭“广伐南国”互证。鼎铭“博戎”仅“执讯二夫、获馘十人”，证明昏是小国，已属西周晚期。此时东夷被周多次征伐，大量南迁淮河流域，国多人满，而沃土、要邑早被周分封诸国的王族、亲族占据。昏作为城、国之名，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必因后迁于此，不是它的故土，杂居诸国之中，地狭人众，一是为生存与扩展土地需要，二是对西周报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与史密簋中肤虎被称为南夷，而广伐东国，返居故地，基本一样。昏的故地当在东国，与史密簋“南夷肤虎”“广伐东国”最为相似。

① 王龙正等《柞伯簋铭文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

② 杨树达《邾有父鬲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七，18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③ 《考古与文物》专刊《古文字论集》(一)。
- ④ 铭文器形照片最早刊《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已发表讨论18篇,收入《近出西周金文集释》,关键问题多未解决,我另详考,不同众说,待发。
- ⑤ 黄盛璋 《保卣铭的时代与史实》,《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保卣铭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213页,齐鲁书社,1982年。
- ⑥ 黄盛璋 《晋侯苏钟在巡狩制度、西周历法、王年与历史地理研究上指迷与发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
- ⑦ 唐兰 《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定域林在泾河上,“堂师地未详”。我最早告吴镇烽此字就是“堂”,他写于《简报》,非袭唐文。但现一般并不认为是“堂”,字既不识,地更不明。《说文》“堂从土,尚声,文堂从尚,京省声”,邑部有籀文加邑,又说为“古文堂字”。铭

文此字上从同“京、亭”上部建筑形,用为形旁,下从“止”表基址,与从“土”意同。楚简“堂”下从“立”,见郭店《老子》及上博楚简,多假为“当”或“棠”等。总之,此字就是“堂”。《风俗通》“堂,楚邑,大夫伍尚为之,其后氏焉”。《左传》皆作“棠”,楚堂君伍尚所封即堂溪,后以封夫概,在西平西百里,驻此就是为防御淮夷。域林为许地。“博戎胡”,胡决非北方之胡人,也不可能南下深入至此,而是在鄆城西。所有战争地名皆在淮河流域,淮戎就是淮夷,所以昏亦称戎。

- ⑧ 详见拙文《录伯东铜器群与战争地理研究》,《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据《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16日2版《河南叶县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古城在叶县西南25公里保安镇前古城村及其西北地,初步定为东周,即春秋之叶。

(责任编辑:曹汉刚)

(上接第30页)

- ②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 ②⑧ 张光直 《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 ②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
- ③⑩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 ③⑪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 ③⑫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 ③⑬ 蔡运章、梁晓景 《洛阳西工区131号战国墓》,

《文物》1994年第7期。

- ③⑭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③⑮ 刘云辉 《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6年。
- ③⑯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 ④① 孙希旦 《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95年。
- ④② 山东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 《巨野红土山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 ④③ 石荣传 《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向 祎)